

戴高乐将军之死

〔法〕让·莫里亚克著

商务印书馆

戴高乐将军之死

〔法〕 让·莫里亚克 著

张 芝 联 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73 年·北京

Jean Mauriac
**MORT
DU
GÉNÉRAL DE GAULLE**
Paris 1972

内 部 读 物

戴高乐将军之死

〔法〕让·莫里亚克著

张 芝 联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人民路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frac{1}{32}$ 4 $\frac{1}{2}$ /8 印张 68 千字

1973 年 6 月第 1 版 197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3017·145 定价：0.52 元

出版说明

夏尔·戴高乐将军于1890年生于法国里尔的一个天主教家庭。1912年以少尉身分参加阿拉斯城第33步兵团,开始他的政治和军事生涯,此后一直在军队和国防部门供职。1940年晋升为将军,并在雷诺内阁中任国防部长。

1940年6月中旬,在贝当卖国政府向希特勒德国投降前夕,戴高乐决定离法迁英;并立即于6月18日在伦敦发表著名的广播演说,号召旅英法人跟他取得联系。贝当政府投降后,他毅然与它断绝关系,发起“自由法国”运动,后改名为“战斗法国”运动,反抗法西斯侵略。1943年,他在阿尔及尔领导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后经改组,成为以他为首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即第四共和国。在第四共和国期间,法国政局不稳,政府屡次更迭。1958年,国民议会授权戴高乐组织政府,并通过新宪法,成立第五共和国。戴高乐在执政期间,奉行维护法国独立和自主的对外政策,反对美帝控制和干涉,反对美帝控制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反对美帝称霸世界。戴高乐在 1969 年 4 月公民投票后辞职。

1970 年 11 月 9 日,戴高乐逝世。11 月 11 日,毛主席在致戴高乐夫人的唁电中,称戴高乐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戴高乐将军之死》一书,系长期跟随戴高乐的新闻记者、作家让·莫里亚克所著。全书共分六章,主要记述戴高乐在 1969 年 4 月至 1970 年 11 月期间的思想和活动、他对 1969 年 4 月法国公民投票的主张、辞职前后与其部属和家属的谈话、在公民投票中遭到失败后的忧郁心情、对待法国政治事务的态度、他对访问我国的考虑,以及游历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情况,等等。本书对了解和研究戴高乐本人以及法国的某些现实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将此书翻译出版,供有关方面参考。

1973 年 3 月

本书有一个来由：戴高乐将军死后，我给法新社写了几篇文章，供一般采用。法新社和它的社长让·马兰先生准许我引用这些报导，我对他们表示感谢。

让·莫里亚克

目 录

第一章	离职.....	3
第二章	1969年6月18日在爱尔兰	40
第三章	1970年6月18日在西班牙	49
第四章	访问中国的计划.....	62
第五章	最后的谈话.....	73
第六章	死亡	102

第一章 离 职

1969年4月20日星期日，即举行公民投票七天之前，戴高乐将军在爱丽舍宫小礼拜堂，参加了由他的姪子弗朗斯瓦·戴高乐神父主持的弥撒。仪式结束之后，他在私宅接待他的儿孙们，他不在科龙贝度周末的时候总是如此的。那天他对他们说：“我知道这次公民投票要失败。从吉斯卡尔·德斯坦声明他不赞成公民投票法计划那时起（这项声明是这位布伊·德·多姆省的代表于4月14日在沙姆里埃尔发表的），我就肯定地知道要失败。我将失去独立派的票，他们将追随吉斯卡尔。”

事实上，据某些同他亲近的人说，直到2月19日（那天在部长会议上正式确定4月27日为公民投票日）为止，将军确实是满怀信心的。就在2月19日之后两天，戴高乐将军向他的几位部长表示他的犹豫，乃至考虑、甚至决定要推迟投票日期。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总理和某些政府成员，几个月来一直坚持要戴高乐将军延期举行公民投票，希望他会放弃这个计

划。有一天，大约在年初，国家元首曾经问过爱丽舍宫主管非洲和马尔加什事务的秘书长雅克·福卡尔：“那么，蓬皮杜以为如何？”他答道：“蓬皮杜认为这次公民投票有失败的危险，而且要我转告你，不如放弃为妙。”

在公民投票的日期确定后若干天，米歇尔·德勃雷曾企图利用将军的踌躇心理，对他说（这已是第二次了），无论就实质来说，还是就日期来说，他都反对这次公民投票，因为法国人民认为这不是当务之急。这次谈话结束后，共和国总统似乎决定要推迟公民投票日期了。他高声说：“人们会讲，戴高乐退缩了！这有啥，退缩并不可耻！”米歇尔·德勃雷同其他几位部长，其中包括曾向将军转达各省省长的悲观报告的雷蒙·马斯兰，当时以为他们的意见已占上风。但是与此同时，将军受到来自相反方面的压力。为数不少的人虽然在公民投票的日期公布之前持反对态度，但认为现在再改变主意已经太迟了。他的一位助手对他说：“公民投票日期正式宣布以后，你不能再退缩了。你会丧失全部威信。这比什么都糟。”于是将军取消了他同米歇尔·德勃雷讲过的话，认为日期既已确定，骰子算是掷出去了。他宣称：“我没有别的可选择了。要不就挑开脓疱，要不我就下台。”

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事后说：“将军自己明

白,如果不重新获得一次人民的赞同,他就无法继续掌权。他的最后的踌躇显然是假装的。照他的老脾气,他在最后的时刻仍向我们提出可能推迟举行公民投票的问题,明知我们会给以否定的回答。然而,不论我们如何回答,他还是会维持公民投票的原议的。”

* * *

4月23日星期三,戴高乐将军确信大势已去,因此知道这是十年多来他主持的最后一次部长会议了。会上的讨论很简单,都是例行议程。在就席以前,他象往常一样,缓步绕桌一周,同政府成员一一握手。将军态度镇静,神情自若。只有一句话令人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宣布散会的时候,共和国总统简单地说:“原则上咱们下星期三再开会。诚然,我们希望下星期再聚。如果事与愿违,法国历史上的一章就此结束了。”这话之前,当时的外交部长米歇尔·德勃雷刚汇报了国际形势,德勃雷说:“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法国的地位问题。有一点很突出:所有国家都对法国表示重视。如果公民投票的结果对我们不利,一切都将大受影响。只有法国人自己不了解这一点……”会议的气氛始终是沉重的。有几位部长在离开爱丽舍宫时,对共和国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说:“我为将军感到难过……”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看到戴高乐将军

在这张桌前，坐在安德烈·马尔罗和米歇尔·德勃雷之间，面对着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总理。这次会议后，一些政府成员，包括安德烈·马尔罗和奥利维埃·吉夏尔，同蓬皮杜先生在圣·日尔曼林荫大道的拉丁美洲饭馆同进午餐。陪客中有埃德蒙·米什莱和《解放了的巴黎人报》社长埃米利安·阿莫里。其中有一位后来在他的个人笔记中写道：“马尔罗向我们预示，将来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

在去科龙贝之前两天，戴高乐将军丝毫没有改变他的计划。部长会议后，他在爱丽舍宫私宅内举行最后一次“亲信们”的会餐。在座有沙隆冬、杜维亚尔、戴旦热、特里科、将军的财政顾问普拉特、副官塔隆上校。尽管国家元首半个月来在私下谈话中并不掩饰“一切都完了”的情绪，但在客多的场合却没有流露出这种想法。然而，这些来宾同参加部长会议的各位部长一样，都认为这是最后一次见到戴高乐将军了。聚餐会上笼罩着沉重、悲郁的气氛。共和国总统态度镇静，彬彬有礼，同往常一样可亲。他对他的财政顾问、出生在里尔的同乡阿兰·普拉特尤其表示殷勤（后来普拉特应将军的请求，曾到科龙贝去审阅《希望回忆录》第一卷中有关经济和社会事务一章。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也曾审阅有关对外事务两章，贝尔纳·特里科审阅有

关阿尔及利亚部分)。

午餐后端上咖啡，夫人们凑在一起闲谈时，将军坐在一张安乐椅上对客人们说：“我完全可以不搞公民投票，但是在我面前有两种选择：或者到我七年任期结束为止毫无作为，或者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由于这次公民投票并不是在严重事件压力下举行的，因此它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如果我们幸运地获得绝对多数票，那么共和国的前途就可以稳定了。”

是否由他本人来稳定这个前途呢？毫无把握。几个月前，共和国总统曾对菲利普·戴高乐说：“我不准备在八十岁以后继续担负我的任务。对一个国家元首来说，太老了。我还不能确定什么时候退休……也许在今年11月22日我生日那天，也许在随后的12月31日……（他曾考虑在他发表传统的新年祝词时宣布离职）。然后，在我死前，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撰写我的回忆录……”在此以后，他有一天还对乔治·蓬皮杜说过：“我不会一直做到任期满了。”菲利普·戴高乐认为，将军打算在区域改革就绪后就退休，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4月23日星期三的这天下午，戴高乐将军照例用来会客。这天召见民航局秘书长雅克·布瓦特罗和高等师范学院院长罗贝尔·弗拉斯里埃。布瓦特罗自1962

年至 1966 年在爱丽舍宫曾任将军的司法和宪法顾问。当天上午，戴高乐将军已经最后探测到多数将投“反对”票。布瓦特罗后来说：“尽管局势严重，他对事业的责任心如此之强，以至他同往常一样，在半小时内心细倾听我向他陈述的关于民航的一些问题（航空人员情况、各区航空港口设备情况）。他虽不抱任何幻想，但是同时，他仍愿意保留几分希望；而在他的内心里，不管外界情况如何，他直到最后仍抱着几分希望。”谈话结束前，将军在提到公民投票时宣称：“好吧，我要告诉你，如果事情顺利，那自然很好；如果不顺利，那也很好……”他把客人一直送到办公室的门口，继续说：“何况，你知道，反正总得重新做起……”布瓦特罗说：“不，不，一定会顺利的。”“咱们瞧着吧……”将军答道。

晚上呢，从 6 点钟开始，他同每天一样接见他的四位主要助手：贝尔纳·特里科、他的办公室主任札维埃·德·拉·史伐勒里、私人参谋长拉朗德将军和雅克·福卡尔。戴高乐将军问福卡尔说：“那么，人们在说些什么？这次公民投票……，肯定的，我们将被击败……”对方试图给他打气。他打断他的话说：“我告诉你，我们被击败了。别给我讲这些好听的故事了，也别给你自己讲了。”他接着说：“星期日晚上 9 时左右以后，当真相已经大白时，该做的事是这一些……”戴高

乐将军这时发了指示：夜间搬运档案，暂时存放在索尔菲利诺街五号（也就是他重新执政前的办公室）。“星期一早晨到中午，爱丽舍宫的全部技术顾问和专员都要离宫。”他补充说：“这一切必须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已经做了这些布置。你要注意，明天在我的最后讲演录音的时候，不能让人有丝毫觉察。”最后，将军给办理非洲和马尔加什事务的秘书长办公处“格勒奈尔街”作了指示：“福卡尔，你必须留在那里。而且，他们会让你留任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国家元首的这个预见没有实现：5月2日，阿兰·波埃先生让国务参事伯比先生接代雅克·福卡尔。）将军补充说：“我们同非洲人的关系是合乎人情的。这种关系是通过你实现的……”他想到忠诚的非洲说：“我不愿让非洲人产生这样的想法，似乎我在最后的时刻没有考虑他们的问题。必须让非洲人知道，我不会忘记他们……”8点差5分，他结束了谈话，以便不错过电视新闻。同每天晚上一样，他亲手关灭了办公室所有的灯，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

* * *

4月24日星期四，这将是戴高乐将军在爱丽舍宫最后一天。约9时3刻，他提着黑皮包来到办公室。同每天早晨一样，他从走廊的旁门进入办公室。副官

办公室的红灯一亮，他们就知道他到了。将军照例看到一份当日要接见的人名单和五份卷宗：一份深红色的皮卷宗，上面用金字刻着“戴高乐将军——信件”，里面是他个人往来的信件；一份灰色卷宗，里面是报刊概述（实际上，戴高乐将军每天早晨在到达办公室前已经翻阅了法国报刊和外国主要报刊）；一份红色卷宗，里面是外交电报；一份浅兰色卷宗，上面刻着“共同体主席先生”几个黑字，内容是关于非洲事务；最后一个卷宗是有关军事问题。看完这些文件后，他按铃叫来值勤副官，这一天是弗洛依克海军上校，他把这堆多数经过批示的文件取走，并照例在每页上盖上一个圆圈里有小型洛林十字旗的橡皮章，表明戴高乐将军已阅此件。

11 时半，这位副官又走进将军办公室，他向例是不敲门的，将一份《法兰西晚报》搁在放电话的小桌上。12 点 1 刻，共和国总统接见米歇尔·德勃雷。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谈话。德勃雷先生再次看到将军时，是在他病逝的床上了。这次谈话历时半小时，戴高乐将军向他的伙伴说了心里话：“骰子已经掷了出去，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法国人民不再需要我，因此我只能走了……”米歇尔·德勃雷还想斗争下去，他对将军说：“你明天的讲演可以把相当一部分动摇分子拉到你这

边来。问题已经不是为区域改革作辩解。问题在于指明：为了一桩艰巨的任务，你需要法国人的支持。要讲得有力，有感情。”将军倾听着他的前总理的话，但没有被他说服。他对他重复说：“法国人希望我走开。但是我将坚持到最后。我将向他们作最后一次讲话。但是我已不抱什么幻想。”

戴高乐将军和夫人看了下午1时的电视新闻的最初几个镜头，就同巴·德·加来省的代表雅克·旺德鲁、即他的妻舅及其夫人，共进午餐。

3时半，国家元首再次接见雅克·福卡尔。福卡尔后来说：“他看来好象是已经离职了。”关于撤离爱丽舍宫、转移档案、迁到索尔菲利诺街的细节他一一作了安排。辞别以前，福卡尔提到了安的列斯群岛、圭亚那和留尼汪岛的舆论反应，对将军说：“你不能在星期日晚间就宣布离职，因为海外各省投票的结果到那时还没有揭晓呢。”将军未予答复，只用手一挥排除了这个论据。

两小时后，共和国总统接见了他的私人秘书处主任札维埃·德·博兰古，博兰古从1954年以来就是他的助手，每星期给将军送一次信件。国家元首在几封信上签了名（确切地说，共六封：几封是收到赠书的谢信，几封是庆祝婚礼的贺信，等等。其中有一封是写给

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副官克洛德·居伊的，他给将军寄来了一封表示忠诚的信)。签署完毕，他转身对博兰古说：“大势已去，我不会回到这里来了。你是否愿意在即将出现的新情况下，继续负责我的秘书处？”博兰古作了肯定的回答。关于这点，将军从未怀疑过。他们研究了有关组织将军的新秘书处的的事务性问题。安顿在索尔菲利诺街完全是临时性的，这点共和国总统很明确，首先因为他决定同过去脱离关系(在法国人民联盟时期，以及在“跨越沙漠”时期，他的办公处都设在索尔菲利诺街)；其次，因为“支持戴高乐将军行动协会”和“公民行动总部”的会址都设在那里。而将军的意思是要干净彻底地引退。正如他写给他的一位助手的信中所说，他希望“不论对别人还是对他自己来说，完完全全同现实脱离关系”。为此，他要求给他的秘书处找一个办公地点。他想不时回到巴黎来，象他重返政界以前那样。他甚至表示，他将恢复他的旧习惯：当他在巴黎逗留期间，下榻于拉·贝卢斯大厦。

在此期间，在将军的左右，有些人曾策划如果在公民表决中“反对”票取胜，就请求蓬皮杜先生宣布他决定不当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他们认为，如果这样，那么由于乔治·蓬皮杜当选而产生的更换总统的解决办法就会消失，与此同时，就会酿成一种“要么是戴高乐，